

近代西方人眼中的宁波(四)

□田力

四美(又译宋美,George Smith),牛津大学文学硕士,英国圣公会来华传教士,香港圣公会首任主教。1844至1846年间,四美相继对中国各通商口岸以及香港、舟山等地进行实地考察,并确定宁波为该差会在中国的传教中心。他还曾于1845年、1850年两度与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伟大先驱之一、《瀛寰志略》的作者徐继畲会面,讨论中国语言和文化。

1847年,四美将其在华考察的经历撰文出版,即《中国各通商城市及香港、舟山两岛考察纪事》(A Narrative of An Exploratory Visit to Each of the Consular Cities of China and to the Islands of Hong Kong and Chusan),该书共有三十六章,其中第十四至十八章专述作者在宁波和舟山的见闻。

四美来华游历的目的主要是“探查各地情况,为英国圣公会其他传教士铺平道路”,所以他关注的是“收集统计资料,记录综合性观察,提供详尽数据,以便对该国社会、政治及伦理道德各个方面做一正确评估”,凡是有助于“透视中国人习俗与特性”的见闻均悉心选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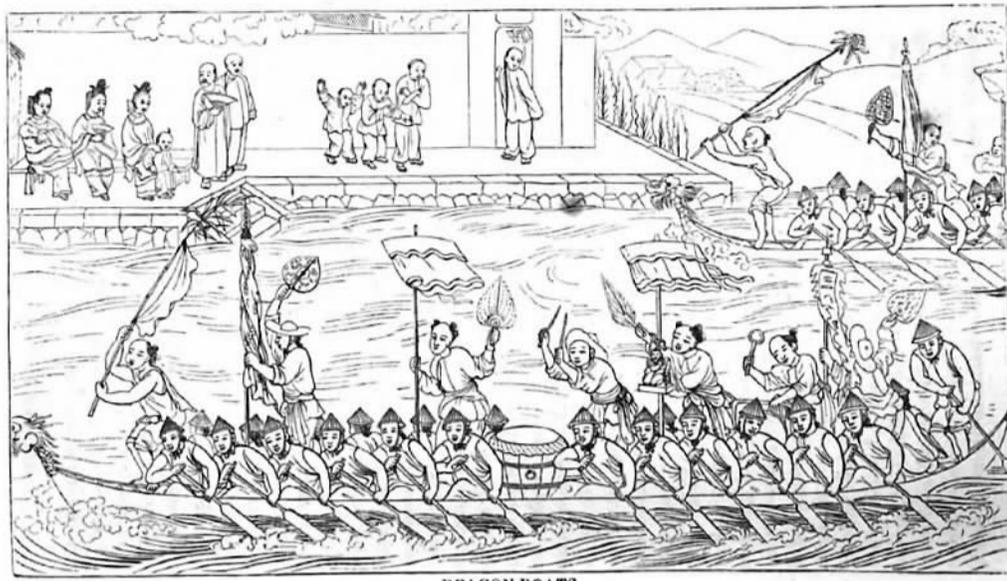
正是出于上述目的和原则,在四美的考察纪事中,虽然对于宁波的地形气候、景物风貌有不少详细生动的描绘,比如甬江、佑圣观、天封塔、回回堂、城隍庙、孔庙、祠堂、天童寺、村野等处,但是他更为关注的是宁波的社会情况,比如社会阶层、管理制度、官僚体系、居民性格、道德状况、宗教信仰、政治局势等方面。

四美对于宁波城和宁波人都很有好感,他写道:“对外国人开放的中国沿海城市中,宁波享有最佳城市之声誉。即使在中国人心中,宁波亦是颇具盛名,被认为是中国的文教兴盛之地,仅次于苏杭”,“宁波居民的特征是中国民众当中令人喜爱的榜样。与外国人打交道时,他们通常显得尊敬、友好”。

不过对于宁波人的性格,四美却有着亦褒亦贬的评价:

正如我们所预期的,宁波人对《圣经》中的律令一无所知。他们的道德标准很低。只要有一线可隐瞒的机会,他们就会罔顾事实、摒弃正直。话说回来,宁波人为人友善平和,即使是在受到极度挑衅时,也多半是君子动口不动手。

他们饮食清淡、很少醉酒,即便没有宗教约束,也是秉性温良,安分守己。他们耽于声色,视之为人生最大享受。金钱使拥有者更有机会寻欢作乐,因而,外国人的洋元一直是他们垂涎欲得之物。他们原本少廉寡耻,在金钱面前更是毫无抵抗之力。外国人只要不显露钱财,便能安全地生活于他们



【出处】四美(George Smith)著《中国各通商城市及香港、舟山两岛考察纪事》第十六章“重游天童寺”插图。

【内容】作者乘船在浙东运河上航行时,见到的两条正在竞渡的龙舟。

中间……

除了因贫穷而起的贪念之外,这些人值得予以毫无保留的信任。在一般平静的环境下,外国人可以独自一人到宁波周围的乡间走上十来里路。虽然出于好奇,偶尔会有一群人围上来,但这里的人没有任何残酷无情、奸诈狠毒的症状。他们有时会受到个别外国人的欺凌,但作者本人可以用自己的切身体会说明,只要一句好话,就会得到当地人真情的回报。作为一名在这些偏北省份与快乐的村民生活在一起的传教士,或者作为一名在各个城市与更为聪明的居民交谈过的传教士,我不能不感到,在没有福音洗涤心灵的情况下,愚昧之人浅薄的人生观在这里达到了力所能及的某种最高境界。

这些评价虽然不完全正确,甚至带有西方人对于异质文化的偏见,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西交往初期,西方人对于宁波人性格的一种认识。

四美还搜集了宁波市民各阶层的统计信息,根据他的记载:

城内的居民,五分之四经商或从事体力劳动,五分之一的人属于士大夫阶层,包括生员与秀才、进士等,公共机构文职人员亦算在其中。通过科举制的各级考试之人,大多在地方上享有重要的文职特权。他们隶属省监考院,可向主考官申请政府低级官职,获取既得权利,或可称之为“士大夫权益”。同时,若当地有迫害之事发生,秀才签名的请愿书对纠正冤案具有相当大的影响。不久前,宁波曾发生过类似案件,一名当地人被指控偷窃,遭受严刑拷打。经该地区四名举人联名请愿,被诬陷之人获得释放,肇事的衙役受到上司的严厉处罚。

郊区的人们,自平原至山地,六成的人以务农为主,三成的人为各种工匠,剩下的一成为渔民和船工。编织地毯、蓆席为许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。妇女中有相当数量的人纺线织布。

此外,四美还注意到明清时期浙东地区的贱民阶层——堕民,并在书中做了介绍。这或许是第一次向西方世界介绍这个阶层:

宁波的大街小巷,每个街角都有轿夫可雇。他们似乎属于一个世代沿袭的阶层,地位卑微,被大众鄙视。轿夫,通常被称作“堕贫”,据说起源于元朝,而在明朝人数大增。据说他们是罪犯的后代,由于犯罪,使整个家庭都不能从事正当职业。这些罪犯中,有

的曾经为官,因勾结倭寇而被治罪。当前,这个受压迫的阶级为附近地区提供所有的轿夫。他们也被雇作剃头匠,还可以做苦力的活。为数不多的还被雇用来做最低等的贸易,私下里赚了不少钱。他们的女人被雇作保姆,从来不会被其他女人尊称为“嫂子”。堕贫一族不许戴有地位的中国人通常戴的帽子,不许穿他们通常穿的衣服。许多堕贫成为戏子。他们人数并不多,估计在2000到3000人之间,仅在浙江省可见,主要居住在宁波、绍兴、台州。尽管四五世纪过去了,他们仍然因祖辈的罪行遭世人唾弃。

居甬期间,四美广泛接触了宁波社会的各个阶层,与文武官员、士农工商、僧尼道俗皆有交往。他也深入观察了宁波社会的方方面面,在一次参观了清军的操练之后,曾这样评价:

武将中无疑存在着保卫帝国的最伟大的勇武精神和赤胆忠心。但是,在西方的杰出技术与技能面前,他们必将每战必败,直到能够克服顾虑,鼓励外国工程师来华服务。这样的一种政策将背离根深蒂固的观念,将明确标志着放弃至今仍保留的闭关自守的做法。这在这个民族现在所处的历史时代似乎是遥不可及的事情。

四美的推断并不正确,仅仅在十余年后,处在内忧外患中的中国就开始了一场大规模引进西方军事装备、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洋务运动。

四美在宁波停留了三个月的时间,他认为这段经历是其“一生中最好的回忆”。而且他也得出结论:“宁波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,市民文化素养极高,且没有受到与外国人广泛贸易而带来的不良影响,便于不受干扰地进行传教工作。”

档案馆

责编 乐建中 美编 雷林燕
2018年1月28日 星期日
照排 车时超



投稿 E-mail: liz@cnnb.com.cn